

# 战略演讲录

郭树勇摇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编 者 的 话

一个民族的崛起 ,往往伴随着战略理性的高扬。俄罗斯、法兰西和德意志诸民族 ,无一例外。战略需要启蒙 ,这是拿破仑战争以来现代军事教育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物换星移 ,大国兴衰。德意志和法兰西民族的历史似乎重新在 19 世纪的东方大国展开。

战略的贫困是民族的大敌。就战略理性生成环境而言 ,当下的中国 ,令人亦喜亦忧。一方面出现了百余年来少有的太平盛世 ,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机遇正向我们走来 ;另一方面 ,一代人的“长期和平”、五千年岁月的传统战略文化和气势正隆的技术理性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思潮 ,这股思潮一定程度上附和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物质力量强势与话语霸权统治 ,在相当范围内造就了失衡、怠惰、分散的国民士气 ,形成了“多战争忧患少战略理性”、“多战略守成少战略创新”之局面。

庆幸的是 ,近年来中央的举措正在改善这种局面。但要彻底为之 ,既需要政府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实施强有力的权威动员 ,也需要有识之士宣扬大战略、大思维 ,双管齐下 ,始能达到重振尚武精神和战略理性之目的。

本着这种精神 ,我们很想奉献出一点思考。近期 ,我们先后邀请李际均先生、刘亚洲先生、张文木先生、房宁先生、倪乐雄先生和门洪华博士到院校讲学。他们观点各有侧重 ,甚至有着根本的学理冲突 ,但均反映了对新时代国家战略的深入和认真的思考 ,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他们的论证和结论 ,但定会从他们的真诚求索精神和浓浓的国家忧患意识中受益。征得同意 ,将其演讲(或论文)整理出版 ,以飨读者。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作者简介

**李际均**摇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孙子兵法学会顾问。

**刘亚洲**摇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将。以研究空中力量战略著称。

**倪乐雄**摇上海师范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文木**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房宁**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门洪华**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郭树勇**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Contents

## 目 录

- |     |     |                   |
|-----|-----|-------------------|
| 1   | 郭树勇 | 导论：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战略问题  |
| 17  | 李际均 | 战争的动因及和平存在的方式     |
| 37  | 倪乐雄 |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
| 57  | 刘亚洲 | 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     |
| 82  | 张文木 |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
| 109 | 倪乐雄 | 海权与中国的发展          |
| 117 | 房 宁 | 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选择    |
| 140 | 张文木 |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
| 175 | 李际均 | 论战略文化             |
| 198 | 郭树勇 | 中华战略文化传统及外交哲学     |
| 232 | 李际均 |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维        |
| 241 | 刘亚洲 | 伊拉克战争的新观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253 | 郭树勇 | 战争合法性、多边战争与中国统一   |
| 277 | 门洪华 | 中国大战略应当从美国经验中学得什么 |
| 290 | 郭树勇 | 后记                |

# 导论 论 摇 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战略问题 摇

郭树勇

## 摇“大国和平崛起”与战略理性之弘扬

和平崛起是中国大国成长中不能绕开的重大问题。要历史地、辩证地研究和和平崛起,既要研究和和平成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又不要放弃战争与战略研究。战争是和平之母,历史上的战争是现实和平的前提。今日的战争,则是未来和平发展的基础。我们今天认真地研究战争与战略,实质上就是为了研究明日的中国和平崛起。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的蓝图是什么呢?

中国力争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和平地成为地区性大国和负责任的世界大国,避免过去几个世纪强权政治图景中大国依靠武力崛起的老路,完成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既实现中国的战略诉求,也符合其他大国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中国要和平地进入世界性大国的行列。

为什么现在才提出和平崛起呢?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发展到今天,才出现了大国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的时代条件与大国崛起的国家条件。后者是指,能够从一个发展中大国上升为世界大国的众多大国中,被认为条

件最全面、速度最快、影响最大的国家，莫过于中国。另外，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会引发霸权战争，频频制造“中国威胁”论调，故和平崛起成为中国化解威胁的一种政治方略。

时代性是和平崛起的逻辑起点。“时代”这个词，是列宁的创造。革命导师用它敲开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大门，而三代中国领导人则用它重新界定了各个时期的战略。和平崛起根本上也源于一种时代判断，这种时代判断不管内容是什么，都要正视人类历史的进步性。用最简单的话说，我们得承认，在远古的时代用大棒随意杀人是正义的，而现在不行了；在近代搞贩运奴隶是正义的，而现在不行；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所使用的“商业战争”、“殖民战争”，我们今天这些后进大国都无缘问津，赶不上那个时代了。在核时代之前，大国还可以用常规武器较量一番，现在也不行了。朝鲜战争是最近的一场大国间战争，那次战争的一方美国，虽然急于取得二战后的第一场胜利，但还是没有使用核武器。美国人不敢使用核武器，不是因为害怕中国，而是因为害怕历史。这个时代的历史，已不是过去时代的历史了。

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强主权制度下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时代，二是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三是人权制度下人类共同体内共处与竞争的时代。第一个时代肇始于三十年战争及其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衰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终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大国间战争乃是维护安全实现利益的主要手段，大国兴衰、格局转换、秩序初定每每伴随战争，根据乔治·莫德斯基的研究，没有一次大国崛起不是通过战争手段来实现的，不管战争对象是衰落的霸权国，还是兴起的挑战国。战争形式往往是总体战。第二个时代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冷战高峰及其第一次美苏缓和，高涨于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并将延伸到 21 世纪的中后期甚或 21 世纪初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大国之间开始把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作为一种原则，维护安全的手段从总体战争向有限战争转换，战争对象不再是其他大国，而是一些小国，大国之间维持一种威慑或冷战状态。华约消失与苏联解体，世界格局转换第一次以非战争的形式完成，大国和平衰落成为现实，大国和平崛起的条件基本出现。第三个时代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类型，但其雏形已经出现在欧盟、北美等区域，在这些相互依赖与集体认同高度发展的共同体内，主权制度逐渐让位于人权制度，战争不再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手段。未来的第三个时代，国家虽然还存在，但有着更加强大的全球治

理体制，大国崛起与衰落只是“世界国家”或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代表权竞争而已。

在时代层面上，当前时代不是所谓的“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第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现实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强权政治时代，不可能存在和平崛起的逻辑。因此，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立场的理论家从来对和平崛起持悲观态度。大国和平崛起理论只能出现在第二个时代，在第三个时代它又会失去现有的含义。因此，只能把第二个时代作为研究和和平崛起理论的时代背景与逻辑起点。

那么，第二个时代就足以给和平崛起带来希望吗？不是的。我们从制度主义出发，正确地找到了大国和平崛起的起点，但是必须从现实主义那里找回第二个时代内的实现和平崛起的力量。绝对的现实主义者看不到和平崛起的曙光，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没有和平崛起的先例。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里，如何和平崛起得了？在缘起的世界政治周期史上，哪个国家不是依靠实力，更具体地说依靠武力成为当时名震环宇的霸主的呢？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时代半个多世纪了，是不是每一个大国都和平崛起了？显然不是，第二个时代只是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需要一种东方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和平崛起的前途。我所谓的东方现实主义，其实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建构主义，但是它是改造了的社会建构主义。我们从朝贡体系的实践来看，东方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实力之上的理念感召，用现在的话是充分利用软权力，同时以足够的军事威慑替天行道，维持天下主义的朝贡国际体系，它是理想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用建构主义的话说，东方社会国际体系的形成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但这种建构力量不仅仅是以“仁”为内核的观念、文化，而且还包括历朝历代的合法性战争。

和平崛起是社会建构与强权角力的统一体，这里的“社会”，既是国内社会，也指国际社会，没有良性的社会互动，和平崛起是一句空话，这里的“强权”，就是指一定限度的权力基础，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可能失去在文明时代生存的资格，可能退回到第一个时代。为了和平发展，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个时代，包括这个时代对战争的要求，这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发展以及国家的中国战略选择。一句话，我们必须正视当下中国的战略理性之缺失。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略理性的高扬。俄罗斯、法兰西和德意志诸民族，无一例外。战略需要启蒙，这是拿破仑战争以来

现代军事教育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物换星移,大国兴衰。德意志和法兰西民族的历史似乎重新在 19 世纪的东方大国展开。

战略的贫困是民族的大敌。就战略理性生成环境而言,当下的中国,令人亦喜亦忧。一方面出现了百余年来少有的太平盛世,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机遇正向我们走来;另一方面,一代人的“长期和平”、五千年的传统战略文化和气势正隆的技术理性,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这股思潮一定程度上附和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物质力量强势与话语霸权统治,在相当范围内造就了失衡、怠惰、分散的国民士气,形成了“多战争忧患少战略理性”、“多战略守成少战略创新”之局面。

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央的举措正在改善这种局面。但要彻底为之,既需要政府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实施强有力的权威动员,也需要有识之士宣扬大战略、大思维,双管齐下,始能达到重振尚武精神和战略理性之目的。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很想奉献出一点思考。今年春夏之交,我们先后邀请李际均先生、刘亚洲先生、张文木先生、房宁先生、倪乐雄先生和门洪华博士到院校讲学。他们的观点虽然各有侧重,甚至有着根本的冲突,但我相信都体现了对战略的深入、认真的思考。我们虽然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我们为他们探索战略真谛的方式与浓厚的忧患意识所震撼,觉得有必要编出一本战略演讲录,引发读者对战略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与争鸣。

---

## 摇摇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时代问题

---

目前处于“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

中国崛起是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这是战略的首要问题。李际均先生认为,目前中国大致处于“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私有制、经济利益是战争的本源,但不否认战争的具体动因和动机的多样性,如权力争夺,领土纠纷,民族和宗教矛盾,争抢资源,甚至对形势的错误判断都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战争的具体动因又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是托夫勒的

“文明冲突论”都没有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所谓文明冲突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西方提出的各类和平理论如“冷战的和平”、“霸权的和平”、“知识信息带来的和平”，以及“国际法的和平”均不成熟，因此现实主义限制战争的和平理念仍居重要地位。冷战后，世界和平存在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国倡导和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李际均先生将当代的战略变革同战争与和平的变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今后的主要战争形态将是高技术常规战争，但还不能断言世界大战将从此绝迹，尤其对每一个具体国家来讲，不论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地位，只要是进行举国应敌的战争，那么就一国来说，在战争动员与战争指导方面还会带有一定的大战特征。同时，随着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发展，大面积、无限度狂轰滥炸的战争场面将变得少见，但这并不是战争暴烈性降低的结果，而是战争手段的变化使得战争的暴烈性由分散变为集中，由面积摧毁变为精确摧毁。在战争双方选定的局部目标上的毁伤将极大地加剧。当代的和平不仅是准备战争的时期，而且是遏制战争的时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遏制战争成为更重要的方面，这是当代和平形态的主要特点之一。

中国的安全威胁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应该特别注意北约东扩与日美安保体系西扩。不能否认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但导致冲突与战争的因素依然深刻地存在着，安全威胁趋于多样化，即所谓“综合威胁”，重大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只是处于潜在形态，变得遥远了一些，因而防备这种威胁的战略预警期加长了。针对有人强调存在威胁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不相称，李先生认为是幼稚之举。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防止战争不能代替准备防御战争与实行防御战争，后者依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盾牌。

总之，李先生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判断，代表的是一种“备战仍需努力，天下还不太平”的观点，为和平发展图景涂上了浓浓的忧患底色。

#### 伊拉克战争对中国军队的三大启示

历史往往是由战争所建构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进入新世纪发动的第二次战争，也是美国与多数盟国产生巨大的分歧的战争，更是一场大规模的高技术战争。世界正在从多个方面反思这场战争对于历史、国际体系以及美国霸权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军事界从指挥体系、情报通信、心理战、空军战役、电子战、后勤战等诸多方面较为成功地总结了这

场战争的启发。刘亚洲先生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对中国军队的发展进行了反思。

战略的基本前提是战争观念。不更新战争观念就走不开提高战斗力的新路子,也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刘亚洲认为,伊拉克战争给我军的第一个启示是,战争观念的改变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最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在经济领域内,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那么,在军事领域内,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放战斗力。和美军同处一个时代,既是我们的不幸,又是我们的大幸。不幸是因为其强大,大幸也是因为其强大。与美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在素质和思想上。观念是最重要的素质。

有了战争观念,就要在其指导下不断地更新战略样式。伊拉克之战后,“战争变小了,战略变大了”。中国的国防战略虽然有了很大的优化,但离中国崛起的要求还有差距,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战略贫困问题,尤其在战略样式的更新方面。在今天世界上,军事战略的发展日趋复杂化,变化速度也日趋加快。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大体上可以说是十年一变,而冷战后的军事战略则为每两三年一变。迄今为止,美国军事战略已经历了九次大的调整。他人变,我也要变。我军目前的战略主要是战争准备问题。

中国军队必须走自己的路,形成中国特色的战争潜在力量。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很难赶上他们。美军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刘亚洲所谓的“毛泽东化”,类似于革命化、政治化,当然也不止于革命化与政治化,它还包括中国古代人的智慧以及现代的人文精神。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天才。我军未来发展应当把握的重心是什么?在刘亚洲看来,我军一定要具备“大赢”的精神,培养和确立一种进攻意识,就是在总体防御战略前提下首先要有强大的反击能力,而不是防御能力,以攻对攻,才能以战止战。与此同时,也要培养“以人为本”意识,“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人文意识与现代精神,也重视推进人才战略,更要有容忍不同思维的精神。

#### 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

战略的确定,首先源于时代与国家安全威胁的正确判断。关于时代,李际均先生从军事角度称之为“成熟战争与不成熟和平的时代”。中国

多数战略学家认为，中国进入了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房宁先生则对这个时代主题作了更加具体的解读。他的学术立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产业资本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应的经济、政治秩序，这些秩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的经济条件。所谓新帝国主义，就是经济接管、政治代理和军事控制。经济接管表现在韩国、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已经丧失了经济主权；政治代理表现为阿富汗、伊拉克等亲美政权，政治、安全安排大致上由美国来决定；军事控制，是指美国在世界上主要的战略地区仍旧实施强有力的军事存在或者影响力。

房宁先生认为，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应该从伊拉克战争中反思国家策略与发展战略问题。既然目前处于一个新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中国就理应适当反思我们韬光养晦的策略。韬光养晦方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时候是个非常正确的抉择，尽管那时候国际格局已经在开始变化，但变化并没有如此之剧烈，如此之深刻，如此之广泛，特别是它没有近在眼前。任何策略都有一种相对性与时代局限。我们必须从相对主义的逻辑，从一个广泛的历史角度来对待战略选择。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外历史上，中国古代汉朝时期对于西北匈奴的绥靖政策，南宋王朝的绍兴议和，都曾经为当时的汉政权维持长期的安全环境发挥了作用。在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争端当中，绥靖主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二战期间的张伯伦主义的失败，使得绥靖主义成为一种贬义词。也许，在当今与未来的一段时期，与强权国家和平共处的策略仍然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策略都具有其历史性与相对性，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根本性的变化，策略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发展经济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在是我们建立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变迁，国际格局的变动，由于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首先要摆正发展经济和国防现代化的关系，就是钱和枪的关系。我们的路子，似乎是先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伊拉克战争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加速国防现代化，这是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物质基础。

#### 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

战争伦理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家就提出了礼战、慎战等观念。近代西方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战争伦理与国际战

争法规。列宁等马克思主义作家也提出了战争的正义性标准。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战争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驯化战争之兽的历史,战争越来越以人类给它圈定的方式、范围和烈度发挥着它的历史的“恶的杠杆”的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变化是我们注重合法性战争的背景。时代主题变了,国际体系的性质变了,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变了,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也变了,中国的国家战略也变了。列宁的“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概念仍是研究合法性战争的出发点,但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一个国家进行的战争虽然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但若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为国际法基本准则所允许,就不是合法的。在现代社会里,特别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谈国际合法性比谈正义性更合适,也更具操作性。战争合法性,是指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情形下符合国际法授权,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人类正义,战争权如何加以自我限制,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战争及其规范的新要求。

中国的崛起要掌握天下大势,洞察战争风云。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发动的四场战争中,从战争合法性角度看,一场是优秀(海湾战争),一场是良好(阿富汗战争),一场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科索沃战争),一场差点得了零分(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的后期,着力给这场战争涂上自由和平的色彩,但为时已晚。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美国的战略优势是发动合法性战争,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多边战争。多边战争不是一般的联盟战争,而是国际体系内主要大国联合起来对付落单国的战争,由于美国占据世界最强军力的地位以及话语主导权,因此,任何地区性大国都必须提防美国护持其霸权的进程中发动针对自己的多边战争。

中国还不是全球性大国,发动多边战争的资源不足,但中国面临着反“台独”战争的重任。而反“台独”战争的最大危险是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中美未来战争冲突的最大可能区域就是台海,因此,中国如何避免与美国为首的多边战争体制在台海冲撞,可能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要义。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但不等于中国对台战争就有充足的合法性,合法性本质上是国内互动加上国际互动。应该下定决心加强战争合法性建设,刚刚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它不仅仅是威慑措施,而且是政治动员、增强民意、制度建设的重要战略性行动,极大地提升了反“台独”战争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坚持做好国际上分化“台独”当局以

及处理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各方的关系。只要国际法、国际道义、联合国以及各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国内国际战略目标不去支持美国的行动，对华多边战争体制就建立不起来，中国的强大国力就会发挥最大的作用，中国的崛起就排除掉了一个最现实的阻力。

## 摇摇中国崛起需要把握的几个战略问题

### 从战略文化或思维把握国际斗争

战略文化或者战略思维研究在中国战略学界属于新兴事物，为什么？因为军事学家与其他社会学家们在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角逐之后终于发现，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主要是由民族或国家构成，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现象的本质就必须要到民族文化中去寻找。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种社会科学都出现了文化热，把这个认识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有了政治文化研究；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研究；国际政治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国际政治文化研究。战略研究也不例外。

对于战争与战略的深入研究，要求对战争文化、战略文化或者战略思维进行研究。只有这种研究，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正如李际均教授所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世界战争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对外军事行为既有变动性也有稳定性，既在变化之中也体现了其稳定的特色。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人从十三州向北美的扩张中，从西半球向世界的扩张中，均体现了美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在战略指向上的一致性，表面上南辕北辙，实质上殊途同归（李际均语）。眼下小布什的进攻性军事战略与保卫“自由民主”的外交战略，不是明显地体现了美国一个世纪之前就大行其道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战略旨趣吗？每一个大国都有其独特的战略

文化传统,每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行动都无法摆脱其战略文化的影响,正如摆脱不了其国家影响一样。

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对外战争实践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理解到这一点对于把握当下的国际政治斗争与合作的真谛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提醒我们,要从本质上了解一些大国的战略,就必须深入掌握其战略文化,而这些大国在国际战略中偶尔外露的侵略性军事行动不过是战争文化的再现罢了,而且还提醒我们,不要为战略文化的某些局部性变迁而过于乐观。李际均教授在战略文化的研究中慧眼独具地指出了这一点:“它(战略文化)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我们知道,长期国际实践形成的国际规范与共识对于特定民族国家的安全观念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类似于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社会教育而更文明化,可国际社会化的力量与速度毕竟不同于国内社会。美国学者卡赞斯坦对于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的研究考虑到了安全文化变动的可能性,但是,日本战略文化中固有的东西也会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泛起。在新时期,日本战略文化体现的形式超出了传统的战争范围,虽然有时也表现为军国主义的再现,而平时的情况下则表现为世界经济战略上的扩张,或者表现为国际政治上的极端跃进意识。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后一种表现形式。

#### 中国战略文化以及毛泽东战略思维对之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大国的行动,有着战略文化的影子。那么,中国战略行动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呢?李际均教授指出:“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对于这一点,郭树勇博士探之于东西方世界主义的对比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环境与理念。西方世界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积极世界主义,而东方世界主义则是一种消极世界主义,西方世界主义实现的历史经验是由点向面,而中国的天下主义是由面向点充实,中华文明大处落墨,吸引周边地区各民族内聚成一个文明结合紧密的共同体,西方在实践中更注意暴力和战争的输出,而中国文明则主要是依靠非宗教的文化感召。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首先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有关,其次受到“以德怀远”战略或礼治战略的影响;再次,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下的民族融合始终是历代民族互动关系的主流。两位学者均认为,中国战略文化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战略设计。

中国的战略文化或者思维，在毛泽东那里达到了极高的体现。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那么，这个太阳也闪耀着中国战略思维的光芒。李际均教授将毛泽东战略思维总结为：第一，是战争哲学思维；第二，是战略全局思维；第三，是战争艺术思维，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四，是战争力量建设思维，即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第五，是统一战线思维；第六，是强国与统一思维；第七，是忧患意识与国家安全思维；第八，是国际战略与反霸思维。这些战略思维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军事战略与国际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毛泽东战略思想特别是人民战争理论，不能动摇。针对所谓“萨达姆发动的人民战争遭到惨败”的观点，以李际均教授为代表的战略学家们认为，伊拉克根本谈不上进行人民战争。萨达姆独裁政权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进行人民战争。不是任何受到侵略的国家其政府都能领导进行人民战争。

现实主义关注战略思维的稳定性，社会建构主义看重其发展性。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战略思维也需要发展。那么，毛泽东战略理论体系需要怎样的发展和充实？不少战略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际均教授认为，战略管理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产生于战争的备战环境，特别是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战略理论体系，侧重于战略思想与原则、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战争准备与实施、作战力量的建设与发展是必然的。而现在则需要增加战争管理的内容。这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例如，国家应变体制与运行机制；战略层次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标准化；国防与军事的法规和制度；国家边防体制的统一管理及其法规；军事职务资格标准；指挥机构的标准工作程度；军队作战能力评估标准；工作绩效评估标准等，都应列入战略理论体系研究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补充游击战走向正规化的一课。”这里的战略管理，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包括了整个国家战略体制的变化，以及中央层次危机管理体制的变化，触及国家战略变迁的深层次问题。

### 海权战略

西人谈战争，言必称陆权论、海权论与空权论。在中国，绝对西方意义的陆权论是不存在的，有的则是陆军主体主义。几千年的中国战略文化主要是和平主义与防御主义的，因此，中国的主导战略思维是陆权思想。今天，中国不能抛弃陆权思想，正如一个海上国家不能抛弃海权思想

一样。但是陆权思想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与限制。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即将到来的时代里,海权与空权战略理论更应得到重视。

眼下时逢郑和下西洋 500 周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海军战略讨论热潮。越来越多的战略学家开始为中国的海权建设出谋划策。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不断扩大的中国国家利益,似乎成为一种朝野的共识。对于中国海权的讨论,有着不同的角度。有人是从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明显劣势出发的,有人是从中国海外利益的被侵害出发的,有人是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出发的,还有是从东亚局势以及中日矛盾的未来演化出发,也有从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海权的失败教训出发的,更多的则是从具体的石油进口利益出发的。这些思考都是可贵的财富,是中国海权战略建构的知识基础。

本书中收录了张文木教授和倪乐雄教授关于海权的演讲。张文木教授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世界历史理论,其时代观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转型,其目的是倡议现代化的军事战略如何为政治服务,为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根本国家利益服务。在张文木看来,“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发展是一个国家主权中必然拥有的一种权利。既然中国是发展的,那么,中国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国概念就应当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的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只要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不管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之所在。”中国目前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中国的安全边界处于不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向外扩展的时代,中国的海上力量必须与这种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倪乐雄教授从战争与文明关系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海权观念。中国未来海权的战略选择,不能简单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理论为依据,而应以世界文明程度为依据。全部问题取决于我们对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断。从现实看,人类仍没有走出“霍布斯时代”,既然这个世界仍受霍布斯法则的支配,中国就不能无视历史上的经验和传统的海权观念,中国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符合现实与逻辑的要求,同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

上述两篇演讲反映的是中国版本的海权论。不幸者,中国的经济晚